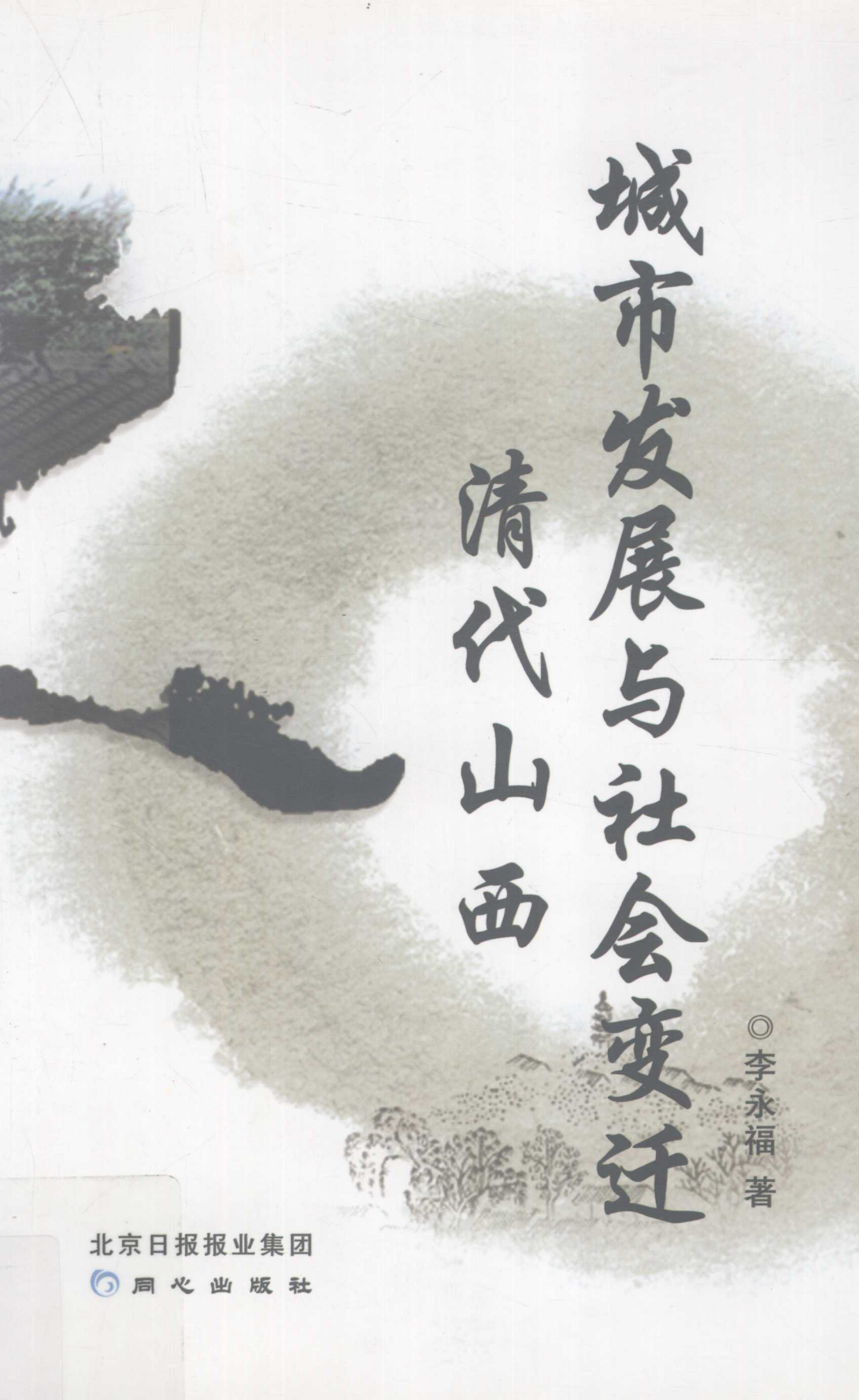




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清代山西

◎ 李永福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8292.5
20123

阅 览

清代山西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李永福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山西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李永福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77-0267-3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城市史—研究—山西省—清代②城市—
社会变迁—研究—山西省—清代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 第 195108 号

清代山西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010-65259206-8022 (发行部)
010-65252135-8015 (总编室)
网 址 www.bjd.com.cn/10txcbs/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导 言

本文为笔者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师从的合作老师为四川大学城市所的何一民先生，报告标题为：清代山西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一、课题意义

一般而言，城市功能不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要素。之所以如此排序，与东方国家，特别是传统时代的中国，有特殊的涵义。中国的传统城市，首先是官府治所，大到都城，次及省垣，再及府州厅县，凡是派官置所的地方，都会形成一个层级分明的城市。换言之，城市的兴起主要是为了满足官府的消费需求。有鉴于此，从原始功能及严格定义分析，“政治性”或“消费性”无疑是中国传统城市存在的至要。

若以学科划分，城市功能嬗变属于城市史考察范畴。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国外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中国城市史，而当时中国的学院教育却以传统国学为主，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的译介工作，更不用说从事纯学术的专门研究。此后的中国，经历了 8 年抗战及 3 年内战，文化人的境遇每况愈下，个人生活都难以维持，哪能侈谈属于新兴学科的城市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存在严重分歧，西方各主要国家在政治上长期不承认我们，经济交流几乎陷于中断，广义上的文化联系亦被人为“窒息”，滥觞于西方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只能是“墙外开花墙外香”，与

中国学人关联不大。

改革开放后，国门渐渐打开，中国大陆与西方大国在改善政治关系的同时，真正意义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局面终于出现，有关城市史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被介绍到中国来。

既然是新兴学科，必然要经历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在国家“七五”社科规划纲要中，首先选择了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四个城市为研究重点，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成果于20世纪90年代初纷纷结题。续其后的研究更以全景式的视角剖析了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何一民先生的《中国城市史纲》可称得上是重要代表作。无可否认，本时段中国城市史研究多选择沿海沿江大中城市为考察范围，毕竟这些地方的中西矛盾与冲突比较明显，反映城市近代化的特质也相对突出，再加之国家在选题上的倾向，称其为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的“先发展区域”一点不为过。

何一民先生曾对21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趋向作过预测，笔者感触最深的是第三点，即“城市发展研究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展，区域城市研究和城市发展类型研究仍将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此外，对众多的中小城市的研究也将随着城市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而广泛开展”。之所以感触良多，在于以上断言既符合学科的发展趋势，又遵循了由点及面的学科进展模式，而笔者所在的山西，因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开展最基础的相关研究，更遑论对属内系列中小城市近代化模式的梳理。

相比较而言，中国众多的内陆城市是城市近代化研究领域的“盲区”，或称之为“被遗忘的区域”。之所以如此，归结起来，原因大致如下：

- 一者，这些地方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
- 二者，它们受外来因子影响有限，缺乏直接刺激的发展动因；
- 三者，前两条因素结合起来，在城市的新陈代谢方面表现得并不突出，难以勾起研究者兴趣。

山西的情形确实如此，表面看，晋商曾驰骋商界五六百年，但其主营业务为长途贩运贸易，除冶铁业、烟草种植及加工业等极少的行业外，所运销的商品大多从外地组织，而销售目的地也重点针对省外和国外市场。明代北部“九关”（九个边镇常驻兵力80余万，最多时达120余万）的

军事性消费，清代的蒙古与俄罗斯市场是其活动的重要舞台。为满足以上需求，山西系列城市不乏众多的商业布点，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省的城市化水平，但与江南各省相比，其商业化程度仍显得相对较低。

近代以来，外商首先看重的中国土特产品无非为茶叶和丝绸，山西不具备此种优势。况且为了降低成本，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依照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也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省份。山西地处内陆，“表里山河”的空间结构不仅使得属内交通极为不便，而且还制约了与省外的联系，直至清末，山西还没有一处开埠城市，缺失外来因子的直接刺激。再加之由清廷主导的洋务模仿运动也是布局在沿海沿江省份的通商口岸，山西只能靠自身的财力发展近代化。如此劣势带来的直接后果为，时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第一批洋货才运抵山西，而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化项目，山西要晚于沿海沿江省份二三十年。

外来因子的滞后不能不限定山西城乡的新陈代谢，尤其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影响更甚。借用汤因比先生的“刺激回应”论，以上大势上的评判更容易理解，毕竟山西当政者的回应相对迟缓，而一般民众的互动又慢了一个节拍。

尽管如此，作为民间代表，晋商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晋商是明清两代著名的大商帮，与徽商并列中国十大传统商帮之首。晋商团体中，又以长途贩运贸易享誉海内外，南来北往间，自然能够体会所在城市的诸多变化，尤其是清道光三年（1823年）左右创办的日升昌票号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续其后的各家山西票号的分号遍设各商业城市，并且左右了当地的金融走向；更为重要的是，旧式商帮以地缘性为特征，总号一般设在故里，各地分号必须定期向总号汇报工作，而分号的号友也多在故乡选拔，这就为异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清代以来，晋中成为晋商的主要渊薮，晋商著名的大商号多集中于此，它们与外地的交流比较频繁，反映到社会变迁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到目前为止，有关华北城市的近代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如果说是起始阶段，该研究局面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有许多理论框架需要建构，而这些工作只能由学科带头人承担。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近代城市

史研究已经在中国大陆发展了 20 多年，本学科的理论框架也大致建立起来，这就逼迫我们晚辈后学应该有所作为，至少将本省在清代的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做一个大致总结，以反映传统时代与近代的异同。

笔者之所以有此大胆设想，是基于山西学界的现实。在山西的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学者重点涉猎的是经济史和社会史范畴，其代表人物为山西大学的行龙、王先明（现供职于南开大学）、刘建生，以及山西师范大学的史若民等先生。在他们的科研成果中，虽也涉及了近代城市，但主要是铺垫性的叙述，并非专门性的研究。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学术贡献，一定程度上为本项研究奠定了基础。

概而言之，本项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拓宽了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范围，即将研究视角延伸到中西部的一般省份。至少到目前为止，本项研究有可能填补山西的一项空白。

其次，具有开拓性的创见，因此前无学者专项研究，而本人具备一定的学科基础，所以诚惶诚恐斗胆尝试。更为重要的是，笔者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求学经历与专业方面，以及工作单位都与本项研究有相当的关联。

第三，选择新视角，以近代化程度比较低的山西省与近代化程度比较高的江苏省做比较，进而综括推动城市发展动因的异同，这在学界也是首次。

二、研究状况

毋庸讳言，中国大陆的城市史研究起步较晚。因为是“后发性研究”，中国学者不能不受到国外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美国学者施坚雅先生的《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至今在中国仍有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大陆真正意义的城市史研究，得益于国家的倡导，上世纪 80 年代，在国家编制“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时，就选定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为城市近代化研究的突破口。各地学者纷纷响应，于上世纪 90 年代以专著的形式一一结题，主要包括张仲礼先生主编的《近代上

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隗瀛涛先生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罗澍伟先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皮明庥先生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以上著作称得上是中国城市史的奠基之作，其中的主要贡献既确立了学科的理论架构，同时框定了学科的基本要素。概括起来，城市史不同于地方史、城市志、编年史，它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作为比较完整意义的城市，至少包括十大要素：地域结构、基础设施、人口、社会、行政管理、经济、流通、信息、文化、生态环境，而所谓城市史就是要研究相关城市的各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发展和演变。对于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动力问题，普遍的观点为外力推动，却不能忽视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城市管理方式、企业经营理念和先进技术等的学习、理解和创新。

社会是一个整体，既然要研究城市的近代化，与之相关联的乡村自然引起学人的关注，在《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中，作者表述了以下观点：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已经对乡村产生了较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加速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城市在政治上压迫乡村，在经济上剥削乡村，造成乡村的落后、破产，最终又延续了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由此而知，以上研究成果已经为本学科的初创作好了铺垫。此后，单体城市研究步入普遍化和深入化阶段，学者的研究方向从对大城市研究向中小城市、从对通商口岸城市研究向其他类型城市扩展。到目前为止，关于北京、成都、广州、杭州、济南、沈阳、昆明、苏州、大连、无锡、本溪、鞍山、洛阳、自贡等城市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

何一民先生的《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以全方位视角解读了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同类性质的专著还有宁越敏先生等人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技出版社 1994 年版）、曹洪涛先生等人的《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8 年版）。此外，在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化的专著中，也有专章论及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如章开沅先生等人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

社 1993 年版)、潘君祥先生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国情透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等等。称这些书目为总揽式的概括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与本课题相关的是区域城市研究,由张仲礼先生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开启了同类研究的先河。不同类型城市的比较性研究成果主要有隗瀛涛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专著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学术论文,学者们各尽所能,在感兴趣的领域辛勤耕耘,共同促成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繁荣。隗瀛涛先生与谢放先生合写的《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载《天津社会科学》1992 年第 1 期)界定了区域城市史的研究范围,即“以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有共同联系和特色的地区的城市体系、城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都市史。”刘海岩先生的《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也提到区域城市研究中应注重和注意的问题:区域城市研究所注重的应是存在由一个或若干个城市为中心,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体系、内部结构功能一体化的大型空间单位。所注意者包括区域发展周期性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区域城市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区域间城市系统的差异性。何一民先生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述评》(载《城市史研究》第 13~14 辑)总结了区域城市系统概念和研究思路的讨论:“实质上反映出近代区域城市史研究者力求突破过分偏重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区域城市的传统思路,寻求以综合性、整体性、联系性为特色进行区域城市史研究的愿望。这同时也是城市史研究者们坚持区域城市史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特色,在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同时坚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自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表现。”

因篇幅所限,笔者列举多集中在区域城市研究方面,这正与本选题相吻合,同时为本项研究提供了铺垫和借鉴。总而言之,在学科体系相对完善的大前提下,选择具有某种特质的区域城市为研究对象,虽然在学科理论上不会有重大突破,但在丰富学科内容方面应该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三、课题创新之处

若以严格的学科界定,有关清代山西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至今在学界仍是一片空白。基于此,本课题的开设有可能弥补中国城市史整体研究的不足,至少可以为区域城市史研究增添些许亮点,毕竟对中国内陆城市近代化的研究还相对滞后,而各个区域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特质又不尽相同。概而言之,本课题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题上符合学科发展趋势,并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学科地位的确立首先在于理论框架的建构,其次才是四处出击、全面“结果”。中国城市史的初创及发展进程印证了这一规律。初创阶段工作关涉奠基工程,它只能由学科带头人承担,有关其情况,前文已有概述。而作为晚辈后学,又长期供职于内陆腹地的高校,结合当地实情探索出一条颇具特色的“结果”之路,无疑是明智之举,选择“清代山西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课题具备了以上特征。

特征之一,近代山西系列城市在建构方面虽无明显的西化痕迹,但在部分城市,尤其是晋中地域的平原城市,其中上层人士在行为及生活方式上并不显落伍。比如,祁县的渠本翘曾参与接办山西首家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双福火柴公司(其前身为官办的火柴局);晋中商人,特别是票号商人,曾踊跃垫款、捐款为收回被英国福公司霸占的山西路矿权利作政府的坚强后盾,并组成了商办的保晋矿务公司;票号商人曾积极认购同蒲铁路股份;还有在乡间的晋商大院里居然安装了电灯,等等。

特征之二,晋商在山西的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与沿海沿江通商城市不同,在民间层面上,山西的近代化主要靠商人来推动,尤其是大商号的驻外商人。山西不乏一些大商号,在分号与总号的信函中,以及3~5年一个“班期”的辗转反复间,或通过信息交流,或亲自带回各地的新鲜产品,潜移默化间推动了山西城市的近代化进程。现有资料表明,鸦片在山西的泛滥,与驻外晋商脱不了干系。当然,这只能视为一个反例。

特征之三,在政府层面上,由于山西先后有曾国荃、张之洞、胡聘之

等洋务派人物执掌权柄，在近代化上的表现仍可圈可点，但限于财力，以及清廷对沿海沿江地区的倾斜政策，山西只能举办一些力所能及的近代化项目，诸如山西机器局的成立及艰难经营等。需要说明的是，山西在教育近代化方面一点不落伍于沿海沿江省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作为清廷教育改革的试点，山西已在官学教育中增加了西学的内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更是创办了名列全国第三位的国立大学——山西大学堂，等等。

（二）理论上借鉴现有学科架构，尽可能总结出内陆城市的近代化特征。时至今日，有关中国城市近代化的理论架构已经大致确立，对“后发展地区”的晚辈后学而言，应该集中主要精力在丰富相关内容方面做些补充工作，而借鉴现有学科架构无疑是每位从业者的首要选择。

按照通行的观点，外力挑战与行政推动应该是沿海沿江通商城市近代化的主要助动器。可是山西却地处内陆，在近代没有一处开埠城市，外来因子的示范效应相对较弱，只能称其为间接推动；又由于山西财力有限，由政府推动的一系列近代化经济措施主要集中在军工企业，仅有的与民生相关的绛州织布局也由于各种原因半途而废，所以只能通过商人的潜意识行为推动当地的新陈代谢。有鉴于此，山西的商业化特征需要认真梳理，换言之，要更多地借鉴商业理论知识。在查阅史料、考察现有城市遗存的同时，也要注重民风民俗的流变，由此而知，民俗学在本课题的理论体系中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从区域城市史的发展方向来看，“满天繁星”的研究局面亦是其内在要求，在“大星”闪耀的同时，亦需要“小星”的辉映，本课题欲达到的目标正在于此，即通过反映以山西为代表的内陆省份近代化模式，以弥补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在整体上的不足。

（三）内容上另辟蹊径，力争开拓出区域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片新天地。毋庸讳言，沿海沿江通商城市仍是区域城市史研究的重点，而众多的内陆城市却少人问津，这既是历史的无奈，同时亦是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吸引尽可能多的同道者，以达到点面结合、全面开花的研究局面。

受地域及研究趋向限制,山西本地学者很少有人从事城市史研究,山西大学历史系的重心在社会史和经济史领域,本省别的综合性大学水平相对较低,在急需突破且有可能突破的地方却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于是笔者不揣浅陋,欲加入这一研究阵营。笔者的勇气在于,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经对山西社会史多所涉猎,而博士论文《山西票号研究》,自以为对晋商,尤其是晋中商人的历史作用分析得相对到位,再结合区域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趋向,于是就贸然选定清代山西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课题为研究目标,以尽可能反映出有所区别的近代化模式。

之所以称之为“蹊径”,是因为研究者寥寥,通过梳理头绪,笔者总结出以下有特质的内容:

其一,在城市近代化的推动力方面,与沿海沿江通商城市相比,山西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即通过驻外商人长期耐心的选择,于潜移默化间融入了外来因子,而不像沿海沿江通商城市那样表现得如此急迫。况且在潜意识里,山西商人的选择或学习是一种自觉行为,而不是外力压迫之下的匆忙嫁接。

其二,在城市功能衍变中,随着山西商人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其社会功能得以彰显,每每民族危机关头,或者事关当地长远发展的一些敏感问题,山西商人总能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历史重任,这既是商人社会价值的体现,同时也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趋向。

其三,由于是内陆城市,致使当地普通民众对外来新鲜事物不太敏感,极大影响到行政功能对近代化推动的实际效果,于是出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上层行政推动与下层自我选择相脱节现象。如此现象既印证了行政功能地位的下降,同时反证了经济功能地位的提升。与此相关联的还有社会功能,据《大公报》记载,正是商人的鼎力相助才促成了山西当局收回路矿权的壮举,这无疑是商人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

四、课题研究基础

本人为历史学科班出身,大学时就读山西大学历史系;硕士时选报的是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读博士的三年时光是在华东师范大

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度过，如此经历应该具有本项研究所要求的专业素养。对中国城市史的理论架构，通过仔细阅读相关书目及学术论文，笔者已大体把握，且多有收获。在读硕士期间，笔者的兴趣圈定了山西近现代社会史，对山西各地民风民俗的流变多所涉猎，笔者的博士论文是《山西票号研究》，经过三年的辛苦努力，对票商的认识已经由直观层面上升到理性高度，而票商是晋商发展的极致，以上积淀很大程度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再加之又得到被誉为本学科带头人的四川大学城市所何一民先生及其他先生的指导，势必会推动本项研究的顺利完成。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山西自然地理环境与城市的兴起发展	1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对山西城市的影响	2
一、表里山河：山西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城市的影响	3
二、悠久厚重：山西早期农业文明与城市的兴起	10
三、资源独特：盐与煤对山西城市发展的影响	18
第二节 中华文明大背景下山西城市变迁	26
一、城市文明的演进： 晋南城市的兴起与山西区域城市体系的构建	27
二、城市功能的嬗递：北部沿边军事城市的崛起与发展	32
第二章 清代前中期的山西城市	39
第一节 明末清初山西城市的破坏与重建	40
一、自然灾害的肆虐	40

二、持续不断的战争	44
三、政局稳定和城市重建	47
第二节 清代前中期山西城市发展特征	52
一、城市数量与城市规模	52
二、城市空间	58
三、城市布局	62
四、晋中城市经济功能的叠加	70
五、晋北与晋西北城市功能的变化	75
第三章 晚清山西城市	83
第一节 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山西城市	85
一、工业文明的边缘：现代城市发展动力的缺失	85
二、中外贸易梯级扩张模式链条中的末端市场	89
三、对外来因素亦步亦趋的回应	92
第二节 晚清山西城市的多元发展	98
一、山西近代化的重心：太原城市的变革	98
二、票号业的聚集地：平遥、祁县、太谷	104
三、晋南与晋中城市经济功能的变化	109
四、新兴资源型城市的初步发展	112
五、现代变迁冲击下的山西山区城市	116
第四章 清代山西城乡关系	121
第一节 政治关系：城市依然统治乡村	122
一、城市对政治资源的垄断	122
二、城市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力在逐步减弱	129
第二节 经济关系：不对称的双向互动	136

一、城市手工业、商业对农村资源的控制	136
二、城乡分离发展：渐趋衰败的农村经济	142
第三节 社会关系：有限的人口流动	150
一、人口流动通道：	
相对固定而狭窄的由“土”入“仕”之途	150
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打工者和城居地主	155
三、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错位	161
第五章 清代山西城市社会变迁	171
第一节 城市人口构成	172
一、人口变迁	172
二、人口构成	178
第二节 城市居民社会生活变化	193
一、生活方式的变化	194
二、风俗习惯的变化	202
第六章 清代山西城市发展特征	213
第一节 纵向分析：前溯后展	215
一、与明代的比较	215
二、与民国时期的比较	217
第二节 横向分析：以江苏省为参照	231
一、清代前中期的比较	231
二、晚清时期的比较	234
第七章 晋商与城市	269
第一节 晋商传统时代的作为	271

一、三个传说与三个城市	271
二、晋商的影响力	273
第二节 晋商在近代的表现	284
一、晋商“未尽其力”的种种苦衷	284
二、解读梁启超眼中的晋商	288
结语	305
后记	319